

## 「一綱一本教科書事件」平議

歐用生

臺北市政府於 2006 年底，宣布推動「北北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引起了一綱一本與一綱多本的爭議，至今尚在延燒。本文從臺灣的社會歷史脈絡，及近十餘年教育改革的政治環境，探討其爭議焦點後發現，一本和多本的爭論成爲政治的議題，國民黨藉此爭取選票，向民進黨政府爭奪教育、課程決策權，最後演變爲「中國化教育」與「臺灣主體性教育」間的對決，甚至成爲民進黨和國民黨間的政權保衛戰。本文主要在分析這些論點，並申述其在課程政策上的意涵。

關鍵詞：一綱一本、教科書政策

收件：2008年5月26日；修改：2008年6月9日；接受：2008年6月9日

# **One-Guideline-One-Version Textbook Contention: A Critique and Analysis**

Yung-Sheng Ou

Toward the end of 2006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ounced its stance of “one-guideline-one-version policy for Taipei City, Taipei County, and Keelung” and joint sponsorship of basic skills achievement test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issue has become a source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one-guideline-one-version group in one camp versus the one-guideline-multiple-versions group in the other.

By way of analysis of Taiwan’s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in the last ten-plus years, this paper has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bone of this textbook policy conten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alled one-version vs. multiple-versions textbook policy is best analyzed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DP) and the Kuomintang Party (KMT) have vied intensively for control of constituent votes,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policy. Specifically,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lies in “Chinese-ized education” versus “Taiwan subjectivity-oriented education.” In essence, the contention manifests a fierce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This paper has served to analyze the intricate complexities entailed in this textbook version contention. It has also explicat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ention for curriculum policy making.

Keywords: one-guideline-one-version, textbook policy

Received: May 26, 2008; Revised: June 9, 2008; Accepted: June 9, 2008

## 壹、前言

2006年年底臺北市長選舉，藍營候選人郝龍斌先生提出「北北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的政見，正面挑戰教育部一綱多本教科書政策和國中畢業生基本學力測驗的入學制度，並於勝選上任後列為「重大政策」，開始推動。其主要作法是聯合臺北縣、基隆市共同辦理基測，先從教育部審定通過的眾多版本教科書中，共同選出北北基最適單一版本，推薦各校循校內會議程序參選採用，北北基基測則以這個單一版本教科書為命題範圍。他們提出的方案將從2008年8月入學的新生開始實施，2011年共辦基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6）。

此後一綱多本和一綱一本教科書的論戰躍上政治舞臺，未曾稍歇，而且越演越烈。這兩年多來，我們從教科書的爭議中間到了濃濃的政治味，看到了中央與地方的爭權，藍綠的政治對立，官方與民間的交鋒。媒體更以「教科書大門法」來形容，甚至認為臺北市與教育部雙方已「拔槍相向」（聯合報，2008/4/28），頗有一觸即發的恐怖氣息，讓人怵目驚心。媒體的報導雖有些誇張，但中央與地方教育政策的衝突尖銳到如此地步，確是臺灣教育史上十分罕見的。

這場教科書政策的爭奪戰，歷經了2008年總統選舉，在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先生勝選，新教育部長上任之後，還在繼續上演，不知是否將會永無寧日？依據媒體的報導，一綱一本的政策甚至影響到新內閣教育部長的人選（聯合報，2008/4/27），內定教育部長鄭瑞城出爐後表明「不會去做一綱一本」，臺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立刻表示，「希望新部長不要只聽少數教改團體的聲音，要多聽家長、多聽孩子的聲音，因為終究苦是苦在孩子、苦在家長。相信學溝通、傳播的鄭部長，不會太堅持一綱多本。」（中央社，2008/4/29）所以北北基推動的「一綱一本、共辦基測」還要繼續進行，看來解決教科書政策的爭議，是新上任的教育部長

立刻將面臨的難題。

中央與地方到底在爭些什麼呢？相信絕對不只是一本或多本而已，也可以說在一本和多本的爭議內，蘊含著複雜的政治權力、意識型態和利益關係，教科書是政治的產物，也是經濟的產物；教科書政策不僅是經濟政策，也是文化政策，Apple（1986, 1993）的這句名言就可嗅出爭論的不尋常。一綱一本教科書政策被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提出來作為競選政見，當然是為了爭取選票，以達到勝選、執政的政治目的。但郝龍斌市長上任後，不惜與中央對抗，強力推動，並一直延續到今（2008）年的總統選舉，一綱一本始終是藍綠對立或衝突的焦點。從事件的演變看來，主導權一直掌握在臺北市，向中央「嗆聲」，爭取教育主導權的意味十分濃厚。所以一綱一本與一綱多本的爭論顯示，兩黨不僅在爭取選票，還在爭取教育、課程決策權，最後兩黨政治人物都加入了戰局，演變為「中國化教育」與「臺灣主體性教育」間的割喉戰。

本文主要從臺灣社會歷史的脈絡，及這一波教育改革的政治環境探討這些問題，先分析「一綱一本教科書事件」的發展過程，探討其爭議焦點，然後申論其在教科書政策和課程改革上的意義。

## 貳、地方與中央在爭些什麼？

首先來看看，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為何要反對一綱多本，而提出一綱一本來爭取選票。按《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明文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則教科書的選擇，自然應該由各校教師集體決定。臺北市府教育局當然知道這項規定，而且也知道所謂「北北基一綱一本」的政策，與《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的規定有扞格之處，那為什麼還要冒這麼大的風險，提出一綱一本的政見，訴諸民意，以爭取支持和勝選？是否一綱多本的實施產生了什麼困難，失去了民心，所以判斷推動一綱一本

可爭取更多選票？

因為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來探討，而且一綱多本的改革是這一波教育改革的一環，與其它的改革是相互關聯的，因此要分析一綱多本的問題，必須從最近十餘年臺灣的政治、社會環境和教育改革脈絡談起。由於教科書在維護「合法化知識」上負有重要的政治使命和意識型態任務，因此教科書國定制一直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但因為教科書市場的經濟利益和龐大商機，使教科書制度成為臺灣教育自由化的第一道缺口。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以後，被威權壓抑的臺灣民間社會力一夕之間爆發，農民、勞工、原住民、女性、教師和教授等紛紛走上街頭，發出聲音，表達看法，爭取發言權。在野的民進黨勢力日增，不斷擴充地方版圖，強力的撞擊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和一元化的思考，舊有的思維和禁忌都面臨巨大的挑戰。臺灣要變，而且要徹底的改變，已潛藏於社會意識的底流。在這種社會氣氛之下，傳統的教育已完全不能適應，非全盤加以改革不可，而第一個被衝擊和挑戰的就是教科書制度。在立法委員和其他壓力團體的操作和操縱下，1988年開始實施國中藝能科教科書審定制，但次後開放趨勢已銳不可擋，1996年國小教科書、2002年國中教科書相繼全面開放，中小學教科書進入了審定制，即所謂「一綱多本」的時代。

教育、課程改革是複雜的社會政治的過程，其實施是無法預測的，也非決策者可以控制的。尤其是將「一綱一本」改為「一綱多本」不僅牽涉到官方知識的重新定位，知識地盤的重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更撼動了決定精英份子社會流動的考試制度，是非常巨大的轉變，當時我們就警覺到這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社會或政治問題，因此呼籲要審慎因應，減少引發的衝擊；尤其要整體社會做概念重建(reconceptualizing)、結構再造(restructuring)，和文化更新(reculturing)，才能真正達到審定制的理想(歐用生, 1996, 1999)。當然教育部為因應一綱多本的實施也做了周詳的規劃和配套措施，如擬訂教科書的審查制度，評鑑標準，規

範教科書的採擇和選用等等，可謂用心良苦。但在教科書複雜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割喉戰下，在根深蒂固的考試文化之下，這些配套措施顯得十分脆弱，不堪一擊，所以一綱多本的實施忽視脈絡的因素，就像將種子種在乾燥的土地上，或種在肥沃的土地上卻缺少水分，注定了一生乖舛的命運，一路蹣跚而行。

在長久以來的教科書國定制下，課程標準由教育部訂頒，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編定，開學時送到教師和學生手上，而這一本就是升學考試的依據，教育部更三申五令，考題不出這一本教科書的範圍。第一課「小貓叫、小狗跳」，全臺的小貓一起叫，小狗一起跳；教師照本宣科，學生拿這一本來記憶背誦，以應付考試，家長也用這一本來幫學生複習，希望得高分。教師、學生和家長雖然辛苦，但大家都用同一本，考試有固定的範圍，標準明確，看起來又很公平，至少大家都覺得很安心。可見這種國定本的制度設計，發揮威權統治和思想統一的社會政治功能，同時也是維繫考試制度公平性的重要機制，因此在重視升學考試的臺灣社會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這是一種封閉的課程系統，也是強調標準、統一、控制的現代性的教科書文化，而這一波的課程改革就是要挑戰這種制度，希望各出版者依據課程綱要和能力指標（綱），發展多元而有特色的教科書（本），而教師、家長等依學校特性選用適合學生的教科書；同時考試是考「綱」不考「本」，「本」雖然各校不同，但「綱」是全國一致的，不會影響到評量或考試。例如吃香蕉的主要目的在獲得維他命 C，這時維他命 C 就是「綱」，香蕉就是「本」，一綱一本認為獲得維他命 C，全國兒童要一起吃香蕉，但一綱多本強調，只要能獲得維他命 C，香蕉、西瓜、鳳梨、蘋果等等都可以吃，師生可自主的選擇任一種教材。如此就能破除對教科書的完全依賴，用多元的學習內容和方法，豐富學生的思考和創意，以因應劇烈的社會變化，這種開放的課程系統和後現代教科書文化正是一綱多本的精義所在。

但這種課程觀念的轉變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在配套措施不足的情形下，一綱多本的開放系統根本無法撼動根深蒂固的國定制，不久就遭來了排山倒海的批判聲浪。一綱多本實施後，琳瑯滿目的教科書沒有給教師帶來專業自主的喜悅，反而為教師增加了選擇的麻煩和難題，每一所學校的教科書都不一樣了，這怎麼考啊？如果從另一本出題怎麼辦啊？一切都顯得很不習慣。教師、家長和兒童背這一本、考這一本的原有的舒適感被擾亂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秩序和標準不明確了，他們開始感覺到焦慮和無奈。他們根本不關心什麼是綱、什麼是本，也不知道什麼是考綱不考本，他們最愛的仍然是一本，也只希望一本就好。尤其在提高競爭力、與國際接軌等全球化的論述之下，臺灣的升學競爭絲毫沒有減輕，因此通過考試、進入明星學校幾乎成為教育的唯一價值，幾乎成為社會的集體焦慮。在這種社會氣氛下，一綱多本成為升學考試的絆腳石，加深了考試的集體焦慮症，失去社會信任的基礎。尤其媒體誤導和操作，以訛傳訛，大家誤解為多本就是每一本都要讀，才能應付考試，出版業者趁勢編「綜合版」的參考書，強力廣告推銷，讓學生人手一冊；補教業者趁機大力宣傳，廣收學生，國中學生幾乎人人都要補習。於是一綱多本又被指控為增加家長經濟負擔和兒童課業負擔的元兇，幾乎人人喊打，批判聲浪蜂擁而至。

但是在這裡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一綱多本或教科書政策自由化是臺灣這一波教育改革政策的一環而已，卻背負了所有教育改革引起的後遺症。1990年代以後的短短幾年間，教育改革方案接連不斷，而且每一個改革方案都揭示嶄新的理念，都標榜新的思維，都在挑戰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定，企圖因應劇變的社會環境的需求，都朝著市場化、自由化、多元化的方向進行，處處衝擊了原有安定的社會體制。但社會還沒有為改革厚植生長的土壤，教師、家長、學生、社會人士等也都沒有接受挑戰的各項準備，果不出所料，教育改革產生的矛盾，一項項的顯現出來，大家都感覺到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師資的培育、任用開放了，流浪教

師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學校行政鬆綁了，「教師會」、「家長會」與「校長」鼎足而三，衝擊了原來穩定的校園文化；建構數學改變了數學教育的典範，師生都難以適應，家長也覺得幫不上忙；九年一貫課程揭櫫的學校本位課程、統整課程、協同教學等新的課程理念，衝擊了分科的、個別的教師文化，引起許多的不安和抗拒；英語、母語和國語教育政策的模糊和反覆，讓師生無所適從；多元入學演變爲多「錢」入學，更助長了補習的歪風。教育部長頻頻換將，政策模糊，朝令夕改，讓人民產生觀望的心理和信心危機。

十年教改啓動前，臺灣的社會機器或教育機器就像農夫駕牛車一樣，緩慢前進，但教育步調和社會步調一致，教育的政策、策略和執行條理清楚，慢中有序，還能往前走。解嚴以後，面臨激烈的社會變化，大家已不耐於改革的牛步化，於是把牛換成馬，希望快馬奔騰。但牛車體沒有改裝，路沒有拓寬，農夫也沒有接受駕馬車的訓練，「農夫」駕「馬」車引來了嚴重的後果，教育步調無法跟得上快速的社會節奏，教育內部的決策和控管出現了偏差，教育改革引起的不適應或後遺症一一浮現，教育機器猶如一部拼裝車，老舊不堪，顯得凌亂失序。大家對教育改革失去了信心，聯合報（2007/12/31）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教育的不滿達 11 年來的新高」，這股失望和無奈的情緒引起民怨，越激越深，而一綱多本卻恰巧成爲這股民怨的「宣洩口」！

教科書幾乎與所有人直接相關，又關連到升學考試，牽涉之廣遠甚於其他改革政策，教科書政策是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爭奪的競技場，圍繞著一綱多本政策又展開了一場血淋淋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割喉戰，更突顯教科書政策的複雜和政治性。尤其民進黨政府藉著教科書，強化「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更刺激了藍綠、統獨的敏感神經，頓時間「一綱多本」成爲代罪羔羊，所有改革引起的問題全部都歸罪於教科書政策，激起「一綱多本」批判的論戰。從大學講堂、各種討論會、研討會、座談會、公聽會，論戰到民意議場或 call in 節目；產、官、學幾乎都上



場，形成一場全民參與的爭論。學者、專家、教師和家長爲了爭奪課程主導權，紛紛投入戰場；民間團體和業者爲了經濟利益也不甘示弱；立法委員爲了選票，當然也要跟著「民意」走。報紙、雜誌、媒體等爲了收視率，也加入了戰局；補教業者爲了生意，更免不了在一旁煽風點火，幫襯鼓譟。於是在立法委員的指揮棒下，全民奏起了「一綱多本批判」的大合唱！「一綱多本」只是一系列教育改革中的一環，卻成爲一個觸媒，引爆了近年來教育改革累積的恐慌和憤怒，教科書開放制背負教育改革的十字架，默默地承受全民的指責（歐用生，2006）！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臺北市政府提出了「一綱一本及北北基共辦基測」的主張，是相當敏覺的。在其「政策說帖」中提到，一綱多本實施後，「教科書周邊教材，如參考書、測驗卷五花八門，且價格跟著水漲船高，爲了使子女在基本學力測驗中脫穎而出，家長購買參考書的負擔必然數倍增加，並將子女送往補習班，造成家長經濟和學生課業的沉重負擔。我們的教科書由過去的統編本到現在的一綱多本的過程中，出現了太多非預期因素的影響，加重了家長與學生許多的無奈與痛苦，也因一綱多本的實施造成城鄉差距的擴大，對偏遠地區及弱勢家庭的學生學習造成不利的影響」（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6）。這個說帖的內容敏銳的抓住了當時的「民意」，一綱多本造成兒童課業負擔、家長經濟負擔，擴大城鄉差距、不利弱勢兒童等都是當時的主流論述，這些也正是造成民怨的主要原因。所以臺北市的政策說帖訴之於人民的情感和情緒，對改革引起的「無奈與痛苦」感同深受，利用感性的訴求來突顯「救贖」的意圖，更企圖利用「專業」的論述來塑造一綱一本的合法化的基礎，以擴大支持，爭取選票。

2006年年底，郝龍斌先生勝選，就任臺北市市長，一綱一本似乎獲得了民意基礎，臺北市政府乃正式宣布，一綱一本政策按照預定時程實施，2008年5月，完成選擇教科書的工作，2011年實施北北基共辦基測。一綱一本的政策聲稱，從「教育部審定通過的眾多版本中，共同選出北

北基最適單一版本教科書，推薦各校循校內會議程序參選採用。……。

同時尊重學校選用教科書的權力，既不違反中央政府一綱多本的政策，也不會回復過去統編本時的傳統做法」（臺北市教育局，2006）。但北北基的共辦基測是以「北北基所公布單一版本教科書為命題範圍」，試問在這種考試的緊箍咒之下，哪個學校敢不乖乖就範？臺北市教育局無視《國民教育法》的規定，用「建議」的巧門，神奇的達成「北北基一綱一本」的政策目標，而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教育法》的精神，已做出了「違法行政」的示範（許育典、凌赫，2008）。照常理推論，如果一綱一本只是為了爭取選票，現在已達到勝選的目的了，臺北市政府「違法行政」在先，應該誠懇與中央政府溝通，解除施政障礙才對，但從事件的發展來看，臺北市反而一再拉高聲勢，與中央互「嗆」，看來一綱一本還有比爭取選票更重要的政治意圖。

為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先分析一下當時的政治環境。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國民黨失去政權，臺灣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一時之間，執政的民進黨，在野的國民黨，及他們的支持者都不能適應。尤其是兩黨的歷史背景、意識型態、政治性格和施政風格，南轅北轍，幾乎無法對話。兩黨的信任基礎脆弱，民進黨不願意和國民黨協商，國民黨對政府的任何作為，也幾乎全力抵制或抗拒。此後藍綠嚴重對立，統獨爭議不斷，族群幾乎被撕裂，臺灣政局陷入了動盪和不安，教育關乎國家認同和國民的政治社會化，很難避免政治的干預，也不幸的捲入了政爭中。這其間經由立法委員和縣市長的選舉，國民黨漸漸收復失土，形成朝小野大、地方包圍中央的政局，對立情勢益形尖銳，藍綠雙方對立往往演變為統獨對立、族群對立，形成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詭異氣氛。尤其在2004年陳水扁先生以些微差距當選連任，並任命杜正勝先生為教育部長，明顯的加強去中國化和臺灣主體性的教育，教育霎時間成為衝突的焦點，任何教育或課程議題都牽動了藍綠雙方的敏感神經。

而一綱多本和一綱一本的爭論正是牽動這個敏感神經的樞紐，我們約略看一下事情的發展。2006年12月，臺北市長郝龍斌與教育局長吳清基宣布推動「一綱一本」政策，臺北縣市立即舉辦19場公聽會，動員支持者發言，大力造勢，藍營7縣市也強力支援，逕行宣布將實施縣市政府選擇教科書。一時聲勢浩大，銳不可禦，給民進黨政府很大的壓力。教育部乃於2007年4月發布《國民教育法》第八條的解釋令，正式發函北北基3縣市，指稱其「以實質方式推動違法政策」的做法，已經嚴重剝奪學校選書權，也公然否定學校教師專業自主權，明顯違反《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規定，要求其立即停止「違法」作為，並移請監察院查處。對教育部的作法，臺北市政府立刻回應，認為中央擴張法令，完全抹殺地方選用教科書的管理監督權限，而且僭越《憲法》及《地方制度法》賦予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他們說，《國民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教育經費是由地方政府自行編列，可見各級學校教育是由地方管理，現在中央卻說地方「有出錢義務，沒建議權利」，豈不荒謬。因此聯合其他7縣市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以釐清教育部是否擴大解釋《國民教育法》。郝龍斌說，「這是教育問題而非政治問題，提出一綱一本是減輕學生壓力，不是與中央對抗。」他強調，一綱一本政策不因釋憲案而停擺，北北基共辦基測也持續進行，預計2008年5月公布單一版本教科書。

緊接著雙方展開一場修法的論戰，藍營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提出《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修正案，要求改為縣市政府選書；同時提出《職業學校法》第四條修正案，企圖為臺北市辦理高職基測尋求法源。教育部不甘示弱於2007年8月，提出「高級中等學校法」草案，將高職改名「專業高中」，明訂高中多元入學招生方式、學區畫分，由中央機關訂定，一般認為這是要封殺臺北市的一綱一本政策。臺北市教育局長吳清基立刻批評教育部「中央集權」，修法只是為了防堵北北基自辦基測，建議教育部乾脆把所有「市立」學校改成「國立」。他表示，高中職屬於地

方教育，各項人事經費、學校設立等開支，都由地方政府補助，教育部的做法根本就是「撈過界」，也抵觸《地方制度法》，更是違反教育鬆綁、權力下放的教改理念。教育部的做法已引起基層家長和學校的反彈，認為教育部根本就是政治力掛帥。他堅決的表示，這不會影響明（2008）年 8 月即將實施的一綱一本政策，2011 年的北北基自辦基測，也會依既定期程辦理（聯合報，2007/8/24）。

對臺北市的一綱一本的「違法」政策，教育部大多以《國民教育法》第八條做為擋箭牌，只能道德勸說：一綱多本符合國際潮流及教師專業自主，一綱一本只會窄化學生學習，嚴重剝奪教師專業自主權，且無法減輕學生及家庭壓力。北北基將於 2008 年 5 月進行選書工作，教育部眼看勸阻無效，乃禁止部編版國中教科書參加北市「教科書評選作業」。教育部國教司長潘文忠表示，北北基由教育局而非各校校務會議評選教科書，違反國教法，所以部編本數學、自然教科書不透過該選書管道行銷。但書商還是會依招標內容，將樣書送到北北基每所國中行銷，「只要學校不參加一綱一本」，學校的選書權和學生的受教權就不受影響（中國時報，2008/4/21）。

從這個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臺北市政府敏覺到一綱多本已淪為各項教改中最被詬病的政策之一，並且被視為是學生課業壓力及家長經濟負擔的主要來源，始終是家長反對最多、希望儘快改進的政策，因此提出一綱一本綁基測的政策，來回應民意的要求。臺北市一再表示，他們是選書「建議」學校「參考」，既不違反一綱多本的精神，也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但絕口不提「北北基共辦基測」已約束了學校的選書工作。臺北市政府向人民軟性訴求，展現「救贖」的企圖心，以爭取支持；但對教育部的態度卻完全不同，一方面據「理」力爭，一再強調一綱一本的適法性，另一方面拉高「敵對」態勢，認為教育部「只給地方有出錢義務，沒建議權利，豈不是荒謬」（聯合報，2007/5/4），更猛批教育部的做法根本就是「撈過界」，並呼籲教育部要「懸崖勒馬」（聯合報，

2007/8/24)，極具挑釁意味。在現行《國民教育法》的規定下，臺北市的作法顯然是遊走於法律邊緣，以因背負教改十字架而飽受批評的一綱多本作為假想敵，挺進中央與地方間的權力的模糊地帶，一再向中央進逼，挑戰教育部的權威，向中央爭奪課程決策權和主導權。

臺灣雖已脫離威權時代，但中央教育部仍權力在握，鮮少接受挑戰，臺北市政府或市政府教育局竟敢對抗中央，雙方對立到如此尖銳，確是臺灣教育史上十分罕見。在此不可忽略的是，臺北市政府對抗教育部不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而是藍綠對立的縮小版，是國民黨的地方對抗民進黨的中央，兩個陣營傾巢而出，藉著一綱一本與一綱多本的爭論，進行「中國化教育」與「臺灣主體性教育」的割喉戰，尤其適逢總統選舉，事關中央政權的爭奪戰，戰況更為慘烈。因市長選舉而登上舞臺的一綱一本的爭議又延燒到總統選舉，捲進兩黨意識型態的漩渦中，自己染上了顏色，不知是否有河清之日？

2008年的總統選舉是兩黨政權的殊死戰，尤其失去政權的國民黨更誓言要收復失土，進行第二次政黨輪替，因此強化對民進黨政府的對抗，全力抵制民進黨政府的施政。這時，民進黨政府漸加速去中國化教育的腳步，更引起國民黨的厭惡，主其事的教育部長杜正勝成為藍營的眼中釘，加以杜正勝的意識型態鮮明，行事風格特異，立刻成為藍營立法委員攻擊的箭靶，言行舉止都被放到顯微鏡下檢驗，教育部頃刻間又站到藍綠政治衝突的第一線。媒體更將他放大：只要與意識型態有關的議題一定是勇往直前，不論是臺灣地圖、歷史課程內容比重、成語使用、白話文言之辯，甚至是聯合國決議文中的臺灣定位，杜部長都以慷慨赴義的果決態度來面對，也難怪多位閣揆異動，其職位卻不動如山。可是對於不涉意識型態的教育政策，諸如大學分級、幼教向下延伸、十二年國教免費、大學退場機制，杜部長卻幾乎是原地踏步，很難看到進展（中國時報，2007/10/19）。又批評，面對百廢待舉的教育問題，教育部用心最力的竟是在配合選舉造勢，忙於政治服務，予人荒疏教育本務之感，

所以呼籲「教育部該回到本業了吧！」(中國時報, 2007/12/11)。

就是在這種社會氣氛和社會期待之下,臺北市府乃登高一呼,挑戰教育部的權威,藍營政治人物和立法委員更一擁而上,給教育部致命的一擊,教科書政策又成爲雙方攻防的焦點。例如教育部長杜正勝認爲當前中小學教科書用語混淆,乃委託「臺灣歷史學會」提出了一份檢核報告,列出五千項的「不當用詞」,如魯班不再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木匠,而是「中國」,「國畫」應改成「中國水墨畫」,「國字」改成「中國字」,「兩岸」改成「兩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改爲孫中山先生;「明代」要講清楚是「中國明代」等。教育部隨即將這份報告函送國立編譯館及各教科書出版社「參考」。雖然杜正勝表示這不是「去中國化」,教育部函也只稱供「參考」,但立刻引起猛烈的批判,中國時報(2007/7/23)的社論最具代表性:很明顯地,這是一個目的性極強的政治動作,而且與其說是「去中國化」,不如形容爲「一邊一國」教育,是爲臺灣獨立建國打底的基礎建設。看來杜正勝想趕在陳水扁總統任期最後的這段時間,以教育部長擁有的公務職權,把國家幼苗都教導成相信中國是和臺灣相區隔的另一個國家,從源頭開始調整下一代的思考方向,澆灌一套完全把中國當外國的國家定義,爲將來的臺灣社會培養出愈來愈全面的臺獨意識,終至讓臺獨成爲長久的主流、永遠不敗的政治正確。

推動一綱一本的臺北市更拉高聲調,猛批教育部,市長郝龍斌說,中央去中國化,市府不以爲然,將提出反制。教育局長吳清基指出,教育部限制教科書用詞的多元化,採取單一制式的行爲,明顯是政治意識型態介入教育政策,市府深感遺憾也無法接受。他說,明年度(2008)北北基共辦基測選擇教科書時,如果教科書廠商依照教育部版本編輯,有政治意識型態介入之嫌,北市將不採用,「如果因爲教科書未修改維持原狀,而被教育部審議退回,市府將視情況請立委凍結教育部審查教科書的相關預算,限制教育部的濫權」(聯合報,2007/7/25)。國民黨和藍營政治人物立刻聲援,全力砲轟教育部是在搞政治、意識型態,根本

是以教科書修訂為由，行文化革命之實，是在發動政治鬥爭，應該受到人民的譴責，教育部長杜正勝應該下臺（聯合報，2007/7/22）。

兩黨黨主席更卯上了，為自己陣營的主張辯護，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對此痛批，這凸顯國民黨的戒嚴史觀，這是一種「黨化教育」，也是大中國的教育意識型態；包括馬英九在內都受到大中國意識型態的教育影響，只有 2008 年讓國民黨再輸一次，國民黨才能真正改變。但馬英九反批，教育部全面「去中國化」的做法，和過去戒嚴時警總審查海外刊物並無不同，贊成在泛藍執政的 18 個縣市全面抗拒，並邀請具公信力與學術良心的學者，共同編輯新的教科書。對陳水扁總統日前表示任內絕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學歷，馬英九也不以為然地表示，臺灣不能長期採取鎖國政策，如果只會關起門來做皇帝，將來不但走不出去，也會逐漸萎縮（聯合報，2007/7/23）。這些爭論顯示了兩黨的教育意識型態的差異。

這幾年來臺灣的教科書政策成為藍綠對立和兩黨政治鬥爭的工具，而主張一綱一本的臺北市更常常跳上第一線，與教育部互「嗆」，以擴大談判的籌碼。從這裡又可看出，臺北市「一綱一本及北北基共辦基測」扮演另一個政治的功能，即作為國民黨對抗民進黨政府的有力武器，來反制政府的教育政策，甚至如果民進黨的「去中國化」太過分時，國民黨可自編「一本」來全面抵制，作為對抗的槓桿的功能十分明顯。

「一綱一本」從一開始被作為候選人的政見提出來時，就已經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此後一直被作為藍綠對立、統獨爭議的擋箭牌，已很難脫離政爭的漩渦。在兩黨對抗的局勢下民進黨政府教育部推動的一綱多本必然成為國民黨反對的政策，更何況其實施又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又引起如此深的民怨，白白送來的大禮國民黨怎麼會不立刻作為對抗的工具，會不大力宣傳，訴之民粹。可見臺北市政府推動的一綱一本是藍綠對立下的產品，是在野黨對抗執政黨的策略的一環，他要反抗的其實不只是一綱多本，更重要的是去中國化的政策，是民進黨政府的教育政策，甚至就是民進黨政府。

## 參、我們從這個事件學到了什麼？

一綱一本教科書爭議事件歷經了臺北市長和總統的選舉，兩黨纏鬥了兩年，戰況之慘烈，中央與地方對立之尖銳，是臺灣教育史上過去沒有看過的。現在選舉結束，國民黨勝選了，一綱一本要反抗的民進黨政府已經下臺，這個事件如何落幕大家都等著看。但不論這個事件如何結束，最重要的是它帶給我們什麼教訓，甚麼啓示，這才是我們關心的，尤其是將這個事件加以批判性的反省和檢討，從這個事件中學習，才是研究這個爭議事件的意義。

首先這個事件是思考教育、課程和政治關係的最好的教材，如 Henderson 與 Hawthorne (2000) 所說的，課程自始至終都是一種政治的活動，在這方面 Apple (1993, 2003)、Giroux (1988) 以及 Pinar (2004) 等學者已經有很多論述，這些論述正好為這個爭議事件作最好的註解。教科書政策是在爭奪「合法化知識」或「正式知識」的問題，也是在爭奪「誰的知識最有價值？」因為它提起了：什麼是知識？誰有權力決定知識？如何決定？這種決定如何成為學校中的真理？這些問題間的關係，也是學校知識和整體社會中的關係。但決定教科書的不是整體社會，而是特定的團體，只代表某些團體的觀點，知識的選擇和組織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過程，為某一特定階級和社會團體的利益服務，代表了更深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關係和歷史。由此可見，教科書及其生產有複雜的政經、文化脈絡，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活動、爭論和妥協的結果。教室中合法化的知識是複雜的權力關係，以及階級、種族、性別、宗教團體間鬥爭的結果，這些爭論隱含了深層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關係和歷史 (Apple, 1993, 2003)。所以 Apple (1993: 48) 說：「與教科書有關的衝突是權力關係的代理人之間的鬥爭」。

一綱一本爭議讓我們看到了代理人之間的戰爭，這個事件不僅只是一本或多本之爭而已，更蘊含了地方和中央間的課程決策權的爭奪，民進黨和國民黨間的意識型態的鬥爭，和中國化教育和臺灣主體性教育間



的對決，看似小蝦米對抗大鯨魚，臺北市政府對中央政府，事實上是民進黨和國民黨兩個陣營所有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間的集體的對決，所以一本與多本實在代表太多的人、團體和主體，不仔細探究易被忽略。所以這個事件為 Apple 等人課程和政治關係的論述賦予內涵和意義，但這個事件的震撼性或許超出 Apple 等人的想像，世界或許找不到這麼鮮活的例子，來驗證課程、教科書與政治間的糾纏不清的關係，也可以說臺灣教科書政策改寫了世界的課程史。

一綱一本從開始被作為候選人政見提出來，已經染上了政治色彩，以後更在有意無意間捲入了藍綠對立和兩黨鬥爭的漩渦中，自己向意識型態靠攏，作為兩黨鬥爭的工具，可能要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教科書政策是重要的公共政策，是公共論述的場域，應該在公共的空間進行專業的論述，作理性的論辯。但臺灣的教科書政策已經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只問藍綠，不問是非，任由意識型態宰制，恐將汙染兒童心靈，汙濁純淨的教育園地，置教育於萬劫不復的田地。政策容有是非，一綱多本或一綱一本各有優劣，應該拋棄意識型態的立場，回到教育專業的平臺，進行批判、分析和論辯。我們一再呼籲（歐用生，2007）：政治（黨）退出教科書政策的爭論，將教科書政策的論述回到公共空間，還給專業，大家進行健康、而有建設性的討論！

其次，這個事件顯現了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模糊，及其引起的教育失序的問題。新教育部長鄭瑞城先生於上任前拜訪全國教師會，全國教師會建議要把中央、地方教育權限畫分清楚，重建教育秩序，一綱一本、自辦基測的爭議，過去可以用中央、北北基分屬不同政黨的藉口來拖延解決，現在雙方同屬國民黨執政，應回歸法理、學理來解決。此外，全國教師會也建議，目前部分縣市為提升學生的國、英、數能力在國小加課，也應該全國一致，不宜出現中央和地方各行其是的情形，問題要依法解決，該修法就修法，不能任由北北基鑽法律漏洞（聯合報，2008/5/13）。

臺灣的教育行政一向是中央集權的，就以課程決策權來說，課程標準由教育部訂頒，教科書由教育部編審，地方政府是無由置喙的。這一波的教育改革啓動以後，一再強調鬆綁和授權，教育部的權威稍有鬆動，地方政府漸漸有了課程決策的空間。例如九年一貫課程剛實施時，課程綱要規定小學英語從五年級開始設置，但各縣市政府面臨家長的要求，紛紛提前到三年級甚或一、二年級開始教學，教育部雖祭出扣押補助款的令符，但縣市長囿於選票的壓力，哪在乎區區補助款，仍各行其是，形成一國數制，十分混亂。現在各縣市政府更各自爲政，好像在比賽一樣。如臺北縣國小從 96 學年度開學起，將國語文增加到 8 節課，不僅超越了臺北市的 6 至 7 節課，更成爲唯一實施國語文 8 節課的縣市。又臺北縣長周錫瑋先生相當重視小學生英語教學，去年指示教育局自 96 學年起實施低年級生開始每週上 1 節，中、高年級每週兩節英語課之後，還是認爲英語課時數不足，要求教育局再研議增加節數。臺北縣政府又宣布，計畫從 97 學年度起再增加兩節英語，將現行低中高年級英語課採 1、2、2 節，增加爲 3、4、4 節，也是全臺灣國小最高的。北北基口口聲聲要實施一綱一本減輕學生負擔，卻一下子增加了 5 節課，將課表擠的滿滿的，只好將週三下午教師進修的時間也用來排課，引來許多教師的反彈，認爲這些決策挑戰教育部國小課程綱要的規定。但教育局強調，該計畫屬實驗方案，雖然北縣小學生每週將比外縣市多上半天課程，但依據《教育基本法》，縣市政府本來就有權自訂課程（聯合報，2008/2/26）。

這掀起了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論戰，教育部花了多少時間和人力，依據「教育原理」和「課程理論」發展出「課程綱要」，頒布實施，就是要維持國家的教育水準，促進機會均等，如果地方政府都認爲我出錢就可以視國家法令如無物，則可能產生教育失序、一國數制的現象。北北基一綱一本突顯的問題則更爲嚴重，北北基很明顯的鑽法律漏洞，和中央玩起教育法令的遊戲，居心可議。北北基違反《國民教育法》在

先，卻一再辯稱，教科書的選擇由各校各領域的老師代表開會決定，各校都有代表，從現有版本中共同討論，選擇一個最好的版本，提供學校參考，3 縣市教育局並未介入教科書的選擇，也不會強迫學校採用，決定權仍在學校。北北基共辦基測所評選的教科書，既未否定各校選用權，也沒有禁止任何版本教科書的發行。但問題的關鍵在臺北市對「北北基基測會依選出的版本命題」隻字不提，而用「建議」這個巧門迴避了《國民教育法》的拘束，透過基測的聯考幽靈的加持後，統一了各校教科書的選用，神奇的達成「北北基一綱一本」的政策目標，而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教育法》的精神（許育典、凌赫，2008）。

教育部對北北基的知法玩法，對地方政府的一再挑戰也束手無策，只能用《國民教育法》消極抵制，一再的道德勸說，選用教科書是個別學校校務會議的權責，學校不得委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其他機關、學校辦理；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亦不得直接或間接介入、干預學校的決定，侵害法律保障的多元內涵。明知無法撼動一綱一本政策的一絲一毫，只能高舉《國民教育法》的盾牌，禁止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部編本國中數學、自然科教科書參加北北基區的一綱一本的選書程序。更不可思議的是，新教育部長上任第一天就說，臺北市教育局把過去「一綱一本」的說法，修正為「一綱多本選一本」，以不違背「一綱多本」的精神（聯合報，2008/5/21）。政策竟然可以說改就改，文字上改一改就可以了，企圖利用文字遊戲來解決政策爭議。難怪法律學者批評，不論對中央或地方的教育官僚來說，這《國民教育法》並不是教育行政的依歸，而不過是用來「鬥爭」的工具。由這場中央與地方的教科書大門法，再次暴露了政府教育官僚法治精神的缺乏，政治權力凌駕於教育法制之上（許育典、凌赫，2008）。「教育部」、「教育局/處」的官員帶頭違法，作了不良的示範，踐踏國家法令，任令教育失序，置學生權益於不顧，不知如何「教育」學生或人民？

第三個問題是，政策批判論述分析的必要。政策是文本、也是論述（discourse），是藉由規訓與禁止「什麼可以說和想、誰可以說、何時、何地、以何種權威說」，來製造所謂的真實（Ball, 1990, 1994）。尤其論述常藉著「中性化」的外衣，塑造了一些真實，但將另一些真實隱藏、消音或扭曲，以達到其目的，最近興起的論述批判分析就是要提供不同的閱讀和詮釋的可能性，尋找被消除的聲音，還原被扭曲的真實（Gee, 2004; Olssen, Codd, & O'neill, 2004; Rogers, 2004）。例如前面我們已指出，北北基一再突顯，他們選出來的教科書只是「建議」各校參考，絕對沒有違法，但刻意避談基測是依據北北基選出來的這一本教科書來命題，其目的就是在隱藏一綱一本政策欲達成的政治、意識型態的意圖。Maguire（2004: 123）說，政治家最精於將能獲得權力的社會運動中性化，而「一綱一本」就被作為這種中性化的工具，一綱一本政策策略性的運用了「減輕兒童課業負擔、家長經濟負擔、縮小城鄉差距、照顧弱勢」的「救贖」的論述，塑造了政策的真實。我們已應用批判論述分析的方法檢討了一綱一本的政策（歐用生，2007），在此我們要再強調，今天學生學習負擔、家長經濟負擔加重，老師教學壓力增加，城鄉差距擴大，是在特定的實施脈絡中形成的，是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的產物，他們將這些現象完全歸罪於一綱多本的政策，是有意扭曲一綱多本的「真實」，以誇大一綱一本「救贖」的宣傳。如果這些環境或條件沒有改變，即使回到一綱一本，教師、學生、家長的壓力仍然增大，城鄉差距依舊擴大，絕對不可能達到他們描繪的桃花源。

Popkewitz（2000）指出，教育改革的知識可視為源自不同歷史軌道的、多種論述相互鬥爭的一種結構配置，或歷史偶然下多種理念相互搭架的一個鷹架，在今天的歷史偶然下，國際化、全球化、政治、經濟、技術、教育、市場化等多種論述和理念相互交織或鬥爭，是教師、學生和家長壓力日漸增大的主要原因。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下，臺灣的教育改革背負著提高國家競爭力、培養 21 世紀新國民的重擔，為完成

這些重大使命，教師、家長、甚至兒童都被捲了進來，PISA 2008「數學第一」與其說是數學教育的成功，應該是家長花了多少金錢，學生犧牲身體和精神，日夜補習、懸樑刺骨的結果。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多元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的論述，將教師、家長和學生都變成商品，投入於市場內，競逐有限的資源，在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法則下，作慘烈的鬥爭，哪會不增加壓力和負擔。所以師、生、家長負擔和壓力增加，有其政治、社會和國際化的背景，絕非一綱一本所論述的，是一綱多本的政策形成的。

爲了因應這些競爭，最近幾年臺灣的教育政策高度強調績效責任，實施各項評鑑、訪視或比賽、競賽，助長了後現代、企業世界的「表演文化」(performance culture)，Ball (2006) 認爲，表演(performativities) 變成爲一種工學，一種文化，一種約制的形式，用 Lyotard (1984: 46) 的話來說，更是一種恐怖的系統，發揮判斷、比較和展演的功能，以作爲控制、鑑別和改革的工具。表演可作爲生產性或成果的量尺，展示品質，或進步、檢視的時刻，表示個人或組織的價格、品質或價值，由此，「財富、效率和真實就畫上了等號」，績效責任、競爭力就是這種新的權力論述，這也是後工業社會中知識生產和傳遞的合法化的論述。它們提供新形式的敘述和新行動的可能性，將我們鼓舞起來，產生新的主體，如何者是有教育的人，何者是教師或研究者。這是生產性的、同時也是破壞性的，在爲專業主義的鬥爭中產生贏者和輸者，在這種競爭、強化和品質的再現的遊戲中，我們更清楚自己。其評估的形式是不確定的，有不同的形式、工具、時間、地點和機構，不斷的被記錄、被評核，讓我們自問：我們做對了嗎？做夠了嗎？是如何在被評量的？造成存有的不安全感。表演產生新形式的實際，教師依此將他們或彼此形成了特定的存有。這種約制或管理(governmentality) 有社會的、或人際的層面，我們彼此評分、紀錄、監視，在這種教育的經濟中，夾雜著物質的、個人的利益，競逐資源、地位和評價。

在這種表演文化的滲透下，師生（甚至家長）被建構為一個表演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其他人、大眾或媒體「多元評量」（Larsen, 2004）。這不僅增加學生課業負擔，教師教學壓力，更助長補習班的孳生，造成社會的焦慮和不安。尤其是補習班「不要輸在起跑點」的煽動，趁教育改革形成的不穩定，激化家長的疑慮和恐懼，大賺教改財。一綱多本實施後，教師、學生或家長負擔依然沉重，是文化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的改變，真的是一綱多本造成的嗎？真的恢復一綱一本就能解決嗎？Popkewitz（2000）說，不是所有的知識都是壞的，但所有的知識都是危險的，表面上都強調為了兒童，提高他們的競爭力，能成為世界的公民，成為 21 世紀的有能力的人。這些看似解放的、救贖的教育論述，事實上是特定的歷史、社會建構的，在為特定群體服務，並沒有為兒童救贖。因此我們要再次強調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的重要。

第四，這個事件突顯了課程改革的複雜和困難。一綱一本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北北基共辦基測，還要以北北基選出的唯一一本作為依據，也就是要回復到過去的聯考，讓過去大家讀一本、背這一本、考這一本的現代性教科書文化死灰復燃。如前所述的，大家都用同一本，考試有固定的範圍，標準明確，看起來又很公平，教師、學生和家長都覺得很安心，很舒適。一綱多本的改革發生了問題，不是尋找根源，設法解決，而是重複過去走過的路，趕快回到從前的「舒適區」，回到一本。廖元豪（2008）批評，有這種懷舊情緒的朋友，往往沒想過，這種教育模式預設著：凡事都有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而且「標準答案」就是老師教的東西！我們從小學甚至到大學畢業，都被訓練去追求或背誦這種標準答案，結果我們的下一代把現狀視為天經地義，既看不出潛藏在制度背後的宰制，更難以想像「另類」思考的存在。孩子們因此受到的弊害還不夠嗎？為什麼北北基構想的高中入學方式，又要回到依賴用一本的統一考試與分發的聯考，又要再強化「標準答案」的思維？

統一、確定、安全、普遍性的幽靈，仍一直伴隨著教育人員，深藏於他們的思考中，從未被質疑。課程學者 Greene (1995)、Eisner (2002) 批判這種標準本位的改革 (standard-based reform)，將目標和期待明確化，只強調可管理的、可預測的、可測量的目標，利用標準化的共同測驗，來達成理性主義的、客觀化的規範，標準化運動讓課程和教學都變成操作性的、模仿式的，將學生的獨特的、有生產性的個殊性隱藏起來，扮演了保守的角色。標準化的課程系統課程，偏好客觀性和正確性重於主觀性和責任，不可避免的壓抑了特定實體間的真正的差異，形成了普同和特定、私和公、理性和熱情間的二分，這種想法扮演了政治的功能，掩飾了主流團體宣稱普同性的觀點，合理化了單一的意思決定的結構。

因此她（他）們提倡從藝術、美學和自傳的觀點，重新審視課程和課程改革的問題 (Berson, 2006; Eisner, 2002; Greene, 1995; Miller, 2005; Rasheed, 2007)。藝術的主要特徵之一是，鼓勵即興演奏和培養個人的理念，藝術活動與目標模式追求可預測性不同，學生的學習速度各不相同，學生對感覺到的、相信的、印象到的事情的解釋和表達也不一樣，多元性、異質性、個殊性等都是藝術教育的特徵。從藝術的觀點來看，結果不一定能測量，也無法完全預測，意圖的不一定能達成，潛在課程一直在發生，不顧個別差異和個人創意，要求同樣的方法、進度和目標，是非民主的。學生將不同的經驗帶進教室，因地區、性向、興趣和目標上的差異，課程也應該不同，所以學校改革不是在追求標準，而要期待並尊重不同的結果，為什麼要每一個人在相同的時間、達到相同的目的地？為什麼要以一種尺寸套在每個兒童身上？為什麼這樣就是重要的教育目的？

Eisner (2002) 說，藝術可以在過程中發現目的，由此產生驚奇，而驚奇是滿足的來源，熟悉和儀式帶來安全感，但沒有產生愉快，驚奇是藝術品中的一種報償，從驚奇中我們學到更多的事情，在藝術和其它領域一樣，驚奇是朋友、而非敵人，師生在工作中都遭遇到未預期的，

沒預測到的，而就是這些事件讓教學愉悅。但標準傷害了這種愉悅，追求預測性和儀式的假定，讓教學失去彈性，沒有注意到脈絡的顏色的變化，標準和標準化阻礙了藝術上最重要的多元、原創、個性和驚奇。當教師、學生有機會決定自己的目的，架構自己的課程活動，不必遵循統一性，決策者越開門接受師生的意見，師生就越有機會發展真正的個性，這種課程促進個別化的活動和個殊化的結果。藝術的功能不在提供可測驗的知識或回答問題，教師的功能不在確定答案或做任何保證，而在激發好奇心和注意力，利用藝術家的義務感來回應標準，回應事情應該如何，有何困難和希望；有能力改變生活，讓我們感覺到、看到或聽到更多，建構過去沒有想過的意義。

Donmoyer (2005) 感慨的說，在美國教育靈魂的戰爭上，強調經驗、美學的 Dewey 輸了，重視標準、統一的 Thorndike 贏得了戰役；但美學改革派仍不認為戰爭已經結束，還在繼續奮鬥。在今天，標準本位改革的旗幟飄揚下，重視標準、統一的「一綱一本」看樣子會贏得臺灣教育靈魂的戰役，到底最容易遵循的路是重覆過去成功的路。如 Grumet (1988: 65) 說的，最熟悉的地方可能就是我們最迷失的地方，如果鳥將自己的命運鎖在鳥籠裏，即使打開了門，它也不想飛出去。許多人不僅希望別人指示他方向，還希望有明確的目的地，才感覺舒服。Duncan (2005) 將這些下意識的行為和社會習俗、習慣、風俗等稱為語意學的網絡，是維持社會安定的重要機制。除非我們覺醒這些網絡，並加以嚴肅的探討和批判，作為指引改革的方向，否則社會改變或課程改革是不可能的。

最後是這個爭議在技術上如何解決？一綱一本爭議事件已延宕了兩年多，歹戲拖棚，已引起民間團體、家長和教師的反彈，近日相關團體大動作到教育部及臺北市教育局陳情，要求雙方溝通，「說清楚、講明白」，解除家長及學生的疑慮，讓大家都安心教學和學習（中國時報，2008/4/23）。依據報導，剛上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先生表示，他的理念



比較傾向「一綱多本」，如今臺北市教育局把過去「一綱一本」的說法，修正為「一綱多本選一本」，以不違背「一綱多本」的精神。但是他更關切的是，北北基共辦基測是否要辦，應該交由升學制度審議委員會進一步討論；言語間可聽出對共辦基測持保留態度（聯合報，2008/5/21）。

這個報導顯示，鄭部長已默認了一綱一本的選書制度，希望藉「區域選書」化解二者之間的矛盾。「區域選書」是日本的作法，以小區域作為單位，共同選書，只東京都就分成 58 個選書區，與北北基將那麼大的區域作為一個選書區的作法是有很大的差異，「區域選書」目前在法令上仍有窒礙難行之處。一綱一本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把這一本與基測「綁」在一起，還是脫勾，更要從長計議，所以要將這些爭議提到將成立的教改檢討委員會討論。

但無論如何，教科書制度的修改也要系統思考，通盤考慮審查、選用、評鑑、計價等問題，更要與升學制度配套改革，否則將重蹈一綱多本實施的覆轍。十幾年的教改，最後仍然存在著「無聯考之名的聯考」，無論是基測或學測，最後仍是一場拚小數點的「聯考」。只要「聯考」實際上存在，一綱多本的實施就遇到困難。從這幾年一綱多本實施的經驗中我們獲得了哪些教訓和啓示，要虛心檢討，引以為鑑，從這裡開始擬定新的政策。政策的宣導更要加強，例如我們很早就建議要公布並分析基測題目，說明各科考題出自各版本哪些學習單元，不論學校教哪一版本，一定都會教到基測考的東西，證明一綱多本沒問題，讀通一本就能應考。但教育部一直沒有公布，任令市場流傳，九年一貫實施一綱多本，要每一本都讀，或多買綜合本的參考書才能應付基測，以訛傳訛，扭曲了改革的精神，加深了教改的困難。

最重要的是教科書的「再概念化」，如果把教科書作為記憶背誦的材料，作為考試評量的唯一依據，那不可能擬定怎麼好的政策，即使有好的政策也不可能實施。許多教師或課程決策者，甚至不了解「考綱不考本」真正涵意，因此加強課程素養或教科書素養應該是全民的功課，

我們不要「一綱一本」，目前需要「一綱多本」，將來希望能「無綱無本」，讓師生一起去創造綱和本，那才是教育的桃花源！

## 肆、結語

一綱一本教科書事件從臺北市長選舉，一直延燒到總統選舉，今天新政府已經上任了，這個爭議仍餘波盪漾，還在爭議當中。為爭取選票而被提出的一綱一本政策，一開始就是政治的產物，就染上了顏色，一路走下來，更自己捲進了兩黨意識型態的漩渦中，有意無意間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課程理論上對教科書複雜的社會、政治特性有很多的論述，他們描述的內容應該沒有臺灣一綱一本的連續劇來得精采，或許這是臺灣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使然，但我們期盼新政府能以「課程專業」的觀點來解決被「政治化」了的這個問題。

這個爭議事件不僅是臺灣教育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例子，為教科書研究、政策研究和課程改革提供相當豐富的題材，也提供給我們許多省思的地方。我們批判性的檢討了這個事件，評述了它的時代意義，不僅豐富了課程研究內涵，更希望由此事件中學習，從中獲得教訓和啓示，這是本文的最主要目的。

## 參考文獻

- 許育典、凌赫(2008/4/23)。教科書大門法。中國時報，A15版。
- 廖元豪(2008/4/17)。標準答案幽靈。中國時報，A15版。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06)。一綱一本與北北基共辦基測政策說帖。未出版，臺北市。
- 歐用生(1996)。教科書事件平議。載於新世紀的課程改革(頁161-177)。臺北市：五南圖書。
- 歐用生(1999)。教科書的評鑑與選用——政治、經濟的分析。載於課程改革(頁177-191)。臺北市：師大書苑。

- 歐用生 (2006)。臺灣教科書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當代教育研究》，14 (2)，1-26。
- 歐用生 (2007)。一綱一本教科書政策論述的批判。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 (主編)，《教科書制度與影響》(頁 27-47)。臺北市：五南。
- Apple, M. W. (1986). *Teachers and 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Apple, M. W. (1993). *Official knowledge-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Apple, M. W. (2003). *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 Ball, S. J. (1994). *Education reform—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ll, S. J. (2000). 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 In S. J. Ball (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V—Politics and policies* (pp. 1830-1840).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 Ball, S. J. (2006). Performativities and fabrication in the education: Towards the performative society. In H. Lauder, P. Brown, J. Dillabough & A. H.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p. 692-7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son, K. M. (2006). *Convers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preted through autobiograph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texts*. New York: Peter Lang.
- Donmoyer, R. (2005). He must not know that the war is over and the other side won, because he just keeps fighting—E. Eisner as advocate for school reform. In P. B. Uhrmacher & J. Matthews (Eds.), *Intricate palette: Working the ideas of Elliot Eisner* (pp. 197-212). New Jersey: Pearson Merrill Prentice Hall.
- Duncan, G. A. (2005). Race and change in education—Toward a semiotics of curriculum. In M. C. Brown II & R. R. Land (Eds.), *The politics of curriculum change: Race, hegemony and power in education* (pp. 211-229). New York: Peter Lang.
- Eisner, E. W. (2002). *The arts and the creation of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ee, J. P. (2004). Discourse analysis: What makes it critical? In R. Rogers (Ed.),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pp. 19-50). New Jersey: LEA.
- Giroux, H. (1988).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N.Y.: Bergin & Garvey.
- Greene, M.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Essays on education, the arts, and social chang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Grumet, M. R. (1988). *Bitter milk: Women and teaching*.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Henderson, J. G., Hawthorne, R. D. (2000). *Transform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Larsen, M. (2004). Mak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quality teacher: A postfoundational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P. Ninnes & S. Mehta (Eds.), *Re-imagining comparative education—postfoundational ideas and applications for critical times* (pp. 129-151).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 Maguire, M. (2004). The modern teacher: A textual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n S. Limblad & T. S. Popkewitz (Eds.),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International*

- perspectives on traveling policies* (pp. 121-141). Connecticu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Miller, J. L. (2005). *Sounds of silence breaking—Woman, autobiography, curriculum*. New York: Peter Lang.
- Olssen, M., Codd, J., & O’neill, A. (2004). *Education policy—Globalization,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Pinar, W. F. (2004). *What is curriculum theory?*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Popkewitz, T. (2000). Curriculum as a problem of knowledge, governing, and the so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l. In B. M. Franklin (Ed.), *Curriculum and consequence—Herbert M. Kliebard and the promise of schooling* (pp. 75-99).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Rasheed, S. (2007). *An existentialist curriculum of action—Creating a language of freedom and possibil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 INC.
- Rogers, R.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In R. Rogers (Ed.),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education* (pp. 1-18). New Jersey: LEA.